

## 第二十二章 平起平坐

七月的下午，阳光明媚，外滩路33号英国驻沪总领事馆内花园的那株上百年的广玉兰，枝叶繁茂，在草坪上形成一片谐意的树荫。树荫之外，生机勃勃的红白相间的小花，点缀着结实的草坪，一直延展到那栋1870年大火後重建的清水砖为墙、蝴蝶瓦为屋顶的领事馆大厦。树荫之内，放着十几把白色的帆布靠背折椅，大英帝国驻上海第十九任总领事巴尔敦（Sydney Barton）正在这里和公共租界行政管理人士和公众领袖开会，讨论处理老闸捕房枪击事件的善後方针。

巴尔敦总领事差不多有六英尺高，一头卷发，穿着亚麻布的夏季西装。他是个烟斗狂，他的座位两侧都放着茶几，茶几上各放着一只藤篮，左侧茶几上还放着一本中文杂志。左侧茶几上的藤篮里放着花榈、杜松、枫树、榉木、忆木、樱树、桥木等各种木材制成的几十只烟斗，巴尔敦从左侧那只藤篮里随意拿起一只烟斗，填上烟丝，抽完一筒把烟斗放到右侧茶几上的藤篮里，然後又回到左侧茶几的藤篮里拿起下一只烟斗，开始抽下一筒。如此重复，直到左侧茶几藤篮里的烟斗全部转移到右侧的藤篮里。据巴尔敦总领事说，他烟斗瘾这么凶是有益健康的，在开始抽烟斗前，他经常患这样那样的流行病。自从抽上烟斗後，就百邪不侵，再也没有什么病痛了。

今天被巴尔敦总领事召来开会的有工部局董事会总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前工部局总董皮尔斯（Edward Charles Pearce），前工部局总董史密斯（Alfred Brooke Smith），巡捕房总督察麦克尤（Kenneth John McEuen），副总督察爱德华巴雷（Edward Ivo Medhurst Barrett），工部局法律顾问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拉亥脱、劳敦、葛立

芬，以及副领事蒲纳德（John Thomas Pratt）。

巴尔敦总领事从去年九月一日至今年五月十九日回伦敦述职，在此期间，蒲纳德副领事代行总领事职务，经历了所有麻烦事情的起步阶段，所以巴尔敦要这位副领事出席今天的会议。

巡捕房总督察麦克尤，高瘦黝黑。他没有前任总督察布鲁斯那么响当当的职业军人背景，却是一位在香港接受专为殖民地培养的科班警务人员。他的祖父是大英帝国最高法院的一名助理法官，他本人的成长过程却全部在远东完成。

在受邀开会的人士还没有到齐前，巴尔敦总领事向总督察麦克尤询问了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干部编制情况。

“自下而上，目前的干部编制是105名副巡长(constable)，96名巡长(sergeant)，11名副巡官(sub-inspector)，11名巡官(inspector)，7名督察(chief inspector)，1名副总督察(deputy superintendent)，1名总督察(superintendent)。”

“督察以上有几个是华人？”

“一个没有。”

巴尔敦总领事听着露出不置可否的微笑。这时，总领事见受邀开会的人士已陆续到齐入座，便搁下巡捕房的编制话题，向大家讲出开会的目的：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暴烈要短暂，施恩要长久。’罢工、游行、开枪、拘捕是暴烈，谈判、和解是施恩。暴烈时间越久，租界越弱。施恩越久，租界越稳。这两点，在座各位想必不会有异议。”总领事边说边向一只木纹美丽的烟斗填烟丝。“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告诉各位，英国政府对善後这场枪击流血事件的态度是，接受华人提出的十三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同华人达成妥协，结束目前的戒严状态。”

巴尔敦的表态出乎所有人的意外，有的人惊讶得全身肌肉都成了冻肉。

巴尔敦继续说道：“目前，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有四股势力正在你掐我脖子、我掐

你脖子地搏斗。哪四股势力？英美为主的租界创世人，布尔什维克俄国，日本人，华人箐英。这四股势力中的布尔什维克俄国和日本人希望暴烈拖得越久越好，租界越乱越好。剩下的两股势力英美人士和华人箐英则希望租界越稳定越好。既然有共同愿望，英美人士和华人箐英就应该达成和解，联起手来压倒前面那两股唯恐租界天下不乱的势力。”

巴尔敦看到出席会议的人对自己的宏论抱着半信半疑的神情，深入地继续说：“我对这四种势力贴上这样对暴烈、施恩的不同标签，既有现实的利益考量也有历史根源。从历史根源来讲，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英法成功挡住沙皇俄国向西方扩展的努力，使沙皇俄国从此以后只能把扩张的目光展向东方。那时，英国很乐意看到民治维新后的日本在东北亚崛起，成为遏制沙俄在东方扩张的主要力量。这个局面稳稳当当地维持三十年后起了变化，沙皇被布尔什维克取代，俄国在世界上变得空前孤立，为了打破孤立的局面，布尔什维克俄国跟处处碰壁的孙文博士的追随者在中国南方挂上了钩；于此同时，日本不再满足于在东亚一角发展。这样，布尔什维克俄国跟日本就同时盯上了富饶的扬子江下游，特别是上海租界这块亚洲最繁荣的地区，千方百计想把我们英美人挤走。无论是利用纱厂工人受虐待教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也好，还是借口保护侨民向租界增派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好，都是要把租界搞乱，从而趁机扩大他们两家的势力。所以，我给这两家贴上希望暴烈越久越好的标签。

“剩下两家势力，我们和华人箐英，对待暴烈的态度刚刚相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英美人曾经对租界开发做出最大的投入，华人箐英跟我们一样，是租界现状的最大获利者，所以我们和华人箐英这两家势力都不愿意看到租界被毁，有什么问题的话，最好是通过谈判妥协，把租界的大局保全下来。所以，我给后面这两家贴上希望暴烈越短、施恩越久越好的标签。这样的结论各位有什么意见吗？”

巴尔敦对听众们的脸色反应很满意，正想继续说下去，却被工部局董事会总董费信惇打断：

“总领事能不能说得清楚一点，如何跟华人妥协？”

总董费信悳是一位来自缅因州政治世家的美国律师，他戴着黑色的玳瑁框架眼镜，笔挺的白色西装配上白皮鞋，衣着比在场的英国绅士们还要正经。

巴尔敦格格地笑着拿起左侧茶几上的那份中文杂志。它是商埠印书馆七月份专为枪击事件出版的《东方杂志》增刊。

“瞧这里，这里，用红笔构出的地方。”巴尔敦把杂志翻到登载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委员会决议书的那页上，用手指点给脸凑近的总董费信悳看。“这些就是租界在行政管理上要跟华人谈判妥协的地方。”

“你是说向华人开放工部局董事会，让华人跟我们平起平坐当工部局董事？”

“条件第十一项就是这麼要求的。”巴尔敦简接地肯定。

树荫下响起一片震惊和不满的嘀咕声。

巴尔敦挥手让大家安静下来。他看起来不像在下命令，却语气不容通融地说：“毫无疑问，上海公共租界的西人是全世界最富有社会责任的一群人，他们以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纳税人会议，牢牢掌握工部局的运作，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他们的影响。但是，工部局董事会成员是西人纳税人会议选出来的。我，英国驻沪总领事，根据法律，是这个纳税人会议的召集人。今天，我请工部局法律顾问的大律师们也来开会，就是为了从法律层面获得对我的支持。我要召开纳税人会议，对接纳华人当工部局董事作投票表决。希望各位协助我，让纳税人会议投票表决同意让华人当工部局董事。这是经外交大臣张伯伦爵士确认的英国政府的立场，也是最符合租界里西人利益的立场。”

“华人进了董事会，以後我们西人说话还有人买账吗？”工部局前总董皮尔斯担忧地问。

“为什么没人买账？董事会里还有日本董事。日本董事说的话，华人董事不会买账；

华人董事说的话，日本董事不会买账。只有我们西人董事说的话，日本和华人董事才可能同时买账。让华人加入董事会，既是跟华人箝英妥协，也是牵制日本人的一种方法。相信我，以后董事会的总董还是西人当选，董事会里那怕华人董事的人数跟西人董事一样多，还是西人董事说话最算数！”

没有人能驳倒巴尔敦的逻辑。

巴尔敦趁热打铁地说下去，“除了接纳华人进董事会，根据条件第七项，巡捕房的干部编制也要作调整。麦克尤总督察，这方面我希望你能拟定一个草案，各级警官直至督察这一级，都要大大增加华人名额。”

“总领事阁下，坦率地说，我觉得要纳税人会议表决同意华人跟我们平起平坐，分享工部局董事会的权力，难度很大。”现任总董费信惇向巴尔敦浇出一瓢冷水。“六年前，也有少数西人提出让华人参政，结果连三成赞成票都没有到达。最後，让五个华人当工部局的咨询顾问作为台阶收场。”

巴尔敦第一次显得有点不耐烦，“六年前，那时没有枪击事件，没有罢市罢课，没有布尔什维克活动，没有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现在，那五个华人咨询顾问已经集体辞职，抗议无职无权。各位是租界的公众领袖，如果各位中有人认为不该让华人加入董事会，把理由拿出来，看看能不能说服我改变主意。如果拿不出理由，光是为了有难度不去做，丧失和华人妥协的大好时机，让租界陷入不可逆转的混乱，那么各位就要为丢失公共租界负历史责任！”

除了蒲纳德副领事之外，所有的听众都张口结舌。没有人提出异议，使巴尔敦总领事信心倍增。为了鼓动这些公众领袖不惧困难，推动纳税人会议作出理想的表决，总领事开始滔滔不绝地跟与会者分享大英帝国如何在其他殖民地处理危机转危为安的事迹：大英帝国这样一个属地、自治领、殖民地横跨五大洲、七大洋的庞大帝国，怎么可能年年风调雨顺、处处国泰民安呢？内忧外患要么交替，要么同时出现，只有保持警惕，充满信心，

处理得当，帝国经历每次局部危机後才会变得更为壮大。1857年，服务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回教士兵大叛乱，东印度公司联合21个印度土邦对付人数四倍于英国正规军的哗变部队，最後接受维多利亚女王兼任“印度女皇”，终于完成大英帝国对印度的直接统治。1897年1月出使贝宁帝国的250人远足使团被当地国王的军队偷袭，只剩两个人活命逃出，一个月後英国的增援力量联合邻国土著，攻佔首都贝宁城，灭了贝宁帝国。。。总之，和当地人结盟是解决危机的万灵药。公共租界西人纳税人会议投票同意华人当工部局董事，就是服用这剂药，让患病的租界康复。这剂药能不能服服帖帖地入胃，全靠在座各位卖力拉票。

巴尔敦使出浑身解数说服到会的西人领袖承诺为他拉票，他举出更多大英殖民当局跟当地人结盟达到双赢的例子。他时而恳求大家不要麻木不仁耽误时机，晚做总比不做强。时而危胁大家英国海军陆战队很快就要撤离租界。

这场树荫下的会议一直开到黄昏才结束。西人领袖们带着满脑子嗡嗡作响的“拉票，拉票，拉票”声离开大英驻沪领事馆。

在费信悖等人还没有把握拉到足够票数的时候，迫于时局的发展，巴尔敦就决定了召开西人纳税人会议的日期。

召开西人纳税人会议的地点选在南京路上的卡尔登舞厅（现大光明电影院）。麦克尤总督察对这次会议的警卫工作了精心安排。开会那天，他派遣一支佩带“值勤”白臂章的印度锡克巡捕将南京路这个地段围堵成细小的通道勉强可以让赴会的西人纳税人的车辆通过。卡尔登舞厅对面的人行道上挤满忙碌的记者，他们不时截住前来参加会议的西人纳税人，问这问那，打听这次纳税人会议的情况，直到被“值勤”的锡克巡捕赶走。

下午一点之前，参加会议的一千多西人纳税人陆续到齐，把舞厅里临时摆好的成排折叠椅坐满八成。鉴于纳税人会议的入会资格，到会的都是公共租界里有相当纳税能力的西人。他们大都互相认识，要么是在社交场合，要么是在处理业务之时，经常发生来往，有的还是亲戚密友。他们就座前，礼貌地互相打招呼，就座後，有的向邻座递上一支有金

色图案的雪茄。

供乐队奏乐的音乐台临时改成大会主席台。主席台前放着投票箱，箱上印着十四个国家的国旗拼成的租界万国旗徽。主席台上，中央摆着铺绿呢桌布的长桌。会议召集人巴尔敦总领事和工部局董事会总董费信惇坐在桌后，他们面前各有一只麦克风。桌上还有一只无主的麦克风，那是为即席发言人准备的。

高高的天花板上所有的照明灯全部打开，光耀得令人抬起头来睁不开眼睛。

一点整，巴尔敦总领事向已腾起蓝色雪茄烟雾的观众席摆摆手。全场安静下来。

总领事宣布开会，“本届公共租界西人纳税人会议现在开始。请费信惇先生就本届大会要表决的华人加入工部局董事会一案作提案说明。”

费信惇穿着深蓝色的西装套装，戴着黑色的玳瑁框架眼镜，手里拿着一叠讲稿，站立起来。他没有看讲稿，好像拉家常一样地对着麦克风开始发言：

“今天巴尔敦总领事召集大家来开会，就是要表决是否同意华人加入工部局董事会。鄙人是该案的提案人，很乐意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提这个案子的理由。

“租界的繁荣依靠的是贸易，华人在租界不仅是我们西人的邻居，而且是我们西人的贸易伙伴。今天，公共租界里的华人人口已经到达八十四万，无论从人口还是纳税的金额都已远远超过我们西人，可以说，没有华人的存在，就不可能有今天租界的繁荣。

“我知道这里有些人会说，是我们西人创建了租界，然后允许华人在租界定居，并且在领事馆里以西人的名义登记每一片土地的地契。是的，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与华人贸易，从他们那里征税，他们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租界的财富。华人不在这里，我们手里的货物就没有市场，因为华人在租界对我们有利，所以我们允许并欢迎他们来。如果，今天我向纳税人会议提交一个要华人全部离开租界的提案，你们都会举起双手反对，因为你们知道自己的生计会没了着落。我敢进一步说，如果华人都离开租界，我们会去找他们回来，因为我们跟华人已经成为贸易共同体。

“既然华人已经并且正在为上海租界的繁荣和财富作出贡献，那么，这个中国最伟大的工商城市的前途，就完全和绝对地需要依靠华洋双方的友善和合作。

“六年前，尊敬的里德立 (Edward Little) 先生曾经向纳税人会议提出容纳华人当董事的提案。很可惜，他今天不能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他已去北京担任澳大利亚驻中国的商务代表。在得到他的同意后，我愿意在这里跟各位重温里德立先生当年的名言如下：作为上海居民 (Shanghaiander)，对于这个城市，我们拥有利益，也为它骄傲，并且希望它能像伦敦、纽约一样，成为大上海。伟大的现实首先源自一些热心者的梦想。如果在我们的董事会里能够同华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建立起伙伴关系，可以乐观地想像，对我们来说，伟大梦想的实现是可能的，不是立刻而是渐进地实现。

“结论是，投票同意华人加入工部局董事会是最符合在座各位利益的明智之举！谢谢各位！”

费信悖的话音未落，还没坐下，观众席里就噼哩啪啦响起掌声、喝彩声，和与之相反的散发不满情绪的嘘声。

“对于费信悖总董的提案，有什么意见？”巴尔敦总领事大声问。

“我附议该提案并要求发言，”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工部局董事会前总董史密斯站起来说。

“史密斯先生，请你上台讲。”

史密斯是仪和洋行的执行董事，当过两年工部局总董。他戴着夹鼻眼镜，穿着条纹西装，站到主席台上那只无主的麦克风后，用在董事会作报告的干脆口气表明他的观点：

“信任和友善是达成任何交易的基础。今天对费信悖总董的提案，是投票表决支持还是反对，决定着 we 跟华人未来在租界的关系。如果我们投票反对，华人的唯一解释就是我们西人没有把他们当一回事，他们会从此跟我们分道扬镳。如果我们投票赞成，就是证明我们西人愿意用行动把华人当作伙伴，这将鼓舞华人尽最大努力，不辜负我们对他们

的信任，从而跟我们西人建立友善的关系。表决前，请各位问一下自己，我们西人需要华人的信任和友善吗？然后决定如何投票。谢谢各位！”

史密斯在掌声和嘘声中走下主席台。

“对于费信惇总董的提案，还有什么意见？”

“我反对提案里给华人三个董事席位，我要求发言！”有人站起来说。

“请上台发言。”

上台发言的是一个戴红点印花领结名叫甘维露 (Lawrence K Kentwell) 的欧亚混血青年。他生在美国，母亲是华人，父亲是英国人。欧亚混血在租界西人里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甘维露的发言内容颇出人意外。他说：

“大家完全明白，华人缴纳的税款佔租界收入的一大部分，但是在行政管理中没有他们的发言权。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华人董事的名额应该是根据他们的纳税额来分配，而不应该硬性规定是三个。对费信惇先生的提案，我提出修正案，每年华人董事的名额应根据上一年华人对租界缴税的份额来决定，这样更符合华人工商学联合会决议里第十一条要求，这样做更能获得华人的友善。。。。”

甘维露还在讲下去，却被一大片嘘声演没。一个愤怒的声音吼道：“这样做，华人董事人数会大大超过西人董事！岂有此理！”

会场里响起更多的声音：“别再讲了！”“闭嘴！”“快下台！”

甘维露不为责难的场面所动，把话全部讲完后才走下台去。另一个欧亚混血青年露雪臣 (Russell B S Chen) 站起来为他喝彩：“甘维露讲得好！我附议你的。。。”

会场里响起更高音的嘘声，没有人听得清露雪臣余下的话。

巴尔敦总领事喊了好几声“肃静！”把喧闹压下去。

“请继续对费信惇先生的提案和甘维露先生的修正案发言。”

一位矮胖戴金丝边眼镜的英国绅士走上台，他是《字林西报》的编辑格林 (O M Green)。

他说：“如果没有大量华人居民来此与我们商业合作，并且带来很多的钱，而且坦率地说他们也支付了大量的税，那么精力充沛、诚实和有能力的外国人的管理也不能把上海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承认这一点是公平的，并且是我们都真心这样认为。

“但是，在1840年代，租界这块地皮并非是我们从中国政府那里侵占来的，而是由中国官员刻意提供给外国人居住的，并且毫无疑问的是那时的中国官员处心积虑地希望外国人远离他们居住的老城，想把外国人关在这片荒凉的地方，就像更早的时候把外国人关在广州蕃坊里一样。凭借外国人投入的精力和正直，才在这快荒滩上建起这座伟大的城市。当初这块土地给我们的时候根本不是现在有些先生说的一块出炉蛋糕，而是一根连狗都嫌弃的烂骨头。（笑声）请各位投票时，不要忘了这点历史。谢谢！”

编辑格林在轰堂大笑里离开主席台。

接着，传教士谢波得（GW Sheppard）牧师走上主台，他的发言简短而尖锐：

“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中国，猖獗地流行敲诈勒索。在这里，对于每一笔交易来讲，敲诈勒索被认为是像空气一样必然的东西，是官场必备的条件，如同《字林西报》所说，那已经成为一个完善的制度，就好比我们不能逃避空气的压力一般，敲诈勒索定义为公职的合法额外收入。如果这样的因素，随着华人当上工部局董事，引入我们的行政机构，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如果允许腐败和敲诈勒索进入我们的行政部门，我们的行政效率就会滑向低效的深渊，向租界以外中国人管辖的华界看齐。这就是我要提醒各位的事情。谢谢大家！”

针对传教士谢波得牧师的尖锐提醒，一位年轻商人上台反驳：

“我是里德立先生的侄子，对于刚才谢波得牧师的提醒，我想引用我叔父6年前首次提出让华人加入董事会时的一段话来中和一下。

“我们大家都承认在华人当中普遍存在敲诈勒索。不知从何时起这种东西已植根于他们的政体之中。长久以来，每一个政府职位都只支付名义上的薪水，这份薪水如此微薄，

还不够支付手底下衙役和幕僚的开销——远不足以维持生活，从最高到最低的职位都会有灰色的财源，这是中国官员获取酬劳的制度，不熟悉这种做法的外国人错误地称其为敲诈勒索。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不是什么秘密或不正常，这同外国官员也可以共享领事的签证手续费有点类似。华人给予他们的官员一些酬劳被认为是正常的、被认可的和获得官方同意的方式。至于，这种酬劳方式会不会像谢波得牧师担心的那样，随着华人进入董事会而引进我们的行政机构呢？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现在一个华人来工部局办事并不需要另外付酬劳，将来有华人当董事後，办同样的事情变得需要额外付酬劳的话，那个华人可以向铨叙委员会告发，对吗？我们应该有信心，西人建立的行政方式会让华人扔掉敲诈勒索的坏习惯，而不是敲诈勒索会淹没西人建立的行政方式！谢谢各位！”

里德立侄子的话赢得的掌声明显多于嘘声。喧闹声後，足足有一分钟没有人再要求发言。巴尔敦总领事觉得火候差不多了，正想宣佈开始投票，坐在他旁边的费信惇向他表示要最後致辞，总领事点点头，作了一个请不要讲太久的眼色。

费信惇的最後致辞确实很短，他说：

“各位，我们不是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领土终将回到中国人的控制之下——那时上海将会是一个伟大的国际化都市，中国最繁荣的贸易中心。对我们西人来说，到了那时我们西人与华人的友善仍能维持，我们西人的商业利益仍能保持，那就是最好的结果。为了到达这个结果，我们西人必须和租界华人结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我的提案就是迈向那个结果的第一步。谢谢各位。”

费信惇讲话後，全场一片寂静。现任总董的话收到立杆见影的效果：一切要保持原状已不可能，西人的商业利益和华人的政治权利必须绑在一齐互相补台！

巴尔敦总领事宣佈开始投票。身穿礼服的工作人员站到成排座位中间的过道，引导写完选票後不断站起来西人纳税人，从左右两边有序地汇成一条队伍，鱼贯来到投票箱前投票。投完票的人通过成排座位两侧的过道回到座位，或离开会场。投票进行到晚上八点

才结束。

第二天早晨，《字林西报》头版以特大铅字发布投票结果如下：

“本报讯：昨晚公共租界西人纳税人会议以五成八的票数通过费信惇总董提议的结纳三名华人加入工部局董事会的提案，以九成五的票数否决甘维露以纳税份额决定华人董事人数的修正案。”

DRAFT